

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

——世纪之初的鲁迅论争

寧臺無計迴神矢風雨
如磐周故園寄意寒
星參不察我以我血薦
軒轅

寫七時辛未年九月十六日也 魯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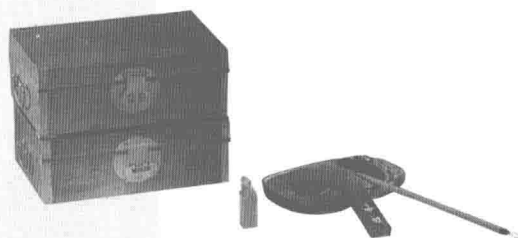
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

東方出版社

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

—— 世纪之初的鲁迅论争

葛涛·编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装帧设计:李 钢

特约编辑:费 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葛涛主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10

ISBN 7-5060-1732-6

I. 鲁… II. 葛… III. 鲁迅(1881—1936)-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6651 号

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

LUXUN DE WUDA WEIJIE ZHI MI

葛 涛 主 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通州区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32.5

字数:513 千 印数:1-7000 册

ISBN 7-5060-1732-6 定价:39.8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序言 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	葛 涛(1)
--------------------	--------

——世纪初的鲁迅论争

一、鲁迅与许广平定情之谜	(27)
--------------------	------

爱情有新的发展	倪墨炎 陈九英(29)
---------------	-------------

《鲁迅与许广平》序一	周海婴(33)
------------------	---------

《鲁迅与许广平》序二	刘绪源(35)
------------------	---------

《鲁迅与许广平》序三	倪墨炎 陈九英(38)
------------------	-------------

着了魔的心理分析	陈漱渝(39)
----------------	---------

 ——读序有感

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几个问题	倪墨炎(42)
-----------------------	---------

关于《魔崇》答倪墨炎先生	周海婴(49)
--------------------	---------

我和海婴先生的交往和争议	倪墨炎(52)
--------------------	---------

一段公案	刘绪源(62)
------------	---------

从《鲁迅与许广平》谈到《魔崇》	倪墨炎(66)
-----------------------	---------

我看《鲁迅与许广平》争论	王锡荣(72)
--------------------	---------

关于《魔崇》讨论中的几个问题	倪墨炎(85)
----------------------	---------

二、鲁迅死因之谜	(97)
----------------	------

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	周海婴(99)
-----------------	---------

揭开鲁迅死因之谜	纪维周(103)
----------------	----------

周海婴写鲁迅读书的二三事	何满子(105)
--------------------	----------

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	秋 石(112)
——质疑《鲁迅与我七十年》	
附录1:《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一文写作、发表的 前前后后	秋 石(126)
附录2:秋石撰文质疑周海婴写书风波又起	陈 香(136)
附录3:《秋石撰文质疑周海婴写书风波又起》一文写作、 发表的前后	陈 香(139)
评价《鲁迅与我七十年》的几个问题	严家炎(143)
驳秋石“爱护鲁迅”的“道义”	周正章(156)
——关于鲁迅死因、毛罗对话等问题	
稠厚的旧世纪的味道	李洁非(184)
——白凤丸、版税及其他	
实事求是——学术论争的基本原则	秋 石(187)
——也论鲁迅之死答严家炎先生	
请尊重周海婴先生的人格	景 迅(196)
再驳秋石关于鲁迅死因的“实事求是”	周正章(201)
鲁迅的“病”与“死”	符杰祥(210)
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真相	周正章(219)
鲁迅死因之谜	王锡荣(270)
答王锡荣并关于鲁迅死因问题	周正章(304)
鲁迅病重、逝世及大出殡始末	秋 石(309)
两个视野中的“鲁迅之死”	庄 严(342)
“鲁迅死因”引起的一场风波	纪维周(345)
是谁言不由衷——十七年前南京《周末》报的 一场风波	张震麟(350)
关于须藤医生及其他——致《鲁迅世界》主编 的公开信	陈漱渝(354)
三、鲁迅丧葬费用之谜	(359)
丧事和棺木	周海婴(361)

鲁迅丧事费用之谜	王锡荣(365)
《鲁迅丧葬费用之谜》的解谜	周海婴(371)
海婴先生,请您讲真话	秋 石(375)
宋庆龄重金资助鲁迅丧葬史实考辨	秋 石(379)
三驳秋石:究竟是谁不讲真话?	周正章(390)
——宋庆龄否认捐赠鲁迅丧仪的声明	
也谈沈钧儒为鲁迅治丧	周海婴(395)
胡风为鲁迅治丧操劳	周海婴(400)
四、“鲁迅活着会如何”之谜	
再说几句	周海婴(411)
对“鲁迅如果活着会如何”的理解	谢 泳(413)
“鲁迅活着会怎样?”	陈 晋(418)
——罗稷南 1957 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	
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	李 乔(430)
——关于周海婴、陈焜披露的两条重要史料	
“毛罗对话”当时为何没有文字记载	廖绍其(434)
我的伯父罗稷南	陈 焜(438)
“孤证”不孤	周海婴(445)
“孤证”提供人的发言	贺圣谟(447)
关于毛泽东和罗稷南的对话	贺圣谟(449)
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	黄宗英(453)
读“毛罗对话”	牧 惠(458)
披露“毛罗对话”史实的启示	黄修己(460)
回到“毛罗对话”的历史情境	范 伟(465)
关于所谓“毛罗对话”的公开信	陈漱渝(475)
——质疑黄修己教授的史实观	
谁制造了这个误区?	秋 石(479)
——也谈“毛罗对话”兼答黄修己先生	

五、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谜 (485)

兄弟失和与八道湾房产 周海婴(487)

兄弟参商为哪般 王锡荣(490)

——鲁迅与周作人究竟为什么决裂

编后记 (513)

序言 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

——世纪初的鲁迅论争

葛 涛

在世纪末“走不近的鲁迅”的论争稍微平息之后,刚进入 21 世纪,有关鲁迅的论争就又再次成为文化界的热点。在 2001 年——鲁迅先生诞辰 120 周年——出版的《鲁迅与许广平》和《鲁迅与我七十年》这两本书不仅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引发了鲁迅研究界的大规模论争。论争的焦点大致集中在如下五个方面:鲁迅与许广平定情之谜、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谜、鲁迅死因之谜、鲁迅丧葬费用之谜、“鲁迅活着会如何”之谜。这些问题中有的鲁迅研究中长期争论不休的,有的是新近披露的,但都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本文侧重梳理这些论争的来龙去脉,试图展示这些论争的全貌。

一、鲁迅与许广平定情、同居之谜

倪墨炎先生在《鲁迅与许广平》(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第 1 版)一书的第 14 节“爱情有新的发展”中写了这样的一段话: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许广平还写了一篇《魔祟》(独幕剧)。作者称它为独幕剧,其实他没有人物的对话,每段都是叙述的语言。它写“一个初夏的良宵,暗漆黑的夜,当中悬一弯娥眉般的月”,B 已熟睡了三个钟头。她的爱者 G,做好工作,照例收拾了书桌,吸完了烟,“放松脚步走到床前,扒开帐门,把手抱住 B 的脖子,小声的喊着 B,继而俯下头向 B 亲吻,头几下 B 没有动,后来身子先动了两下,嘴也能动了,能应 G 的叫声了,眼睛闭着,B 的手围住 G 的颈项,坐了起来。B 不久重又睡下,这时床上多添了一个 G。”……这剧发生地点:“一间小巧的寝室,旁通一门,另一间是书房。”这正像是鲁迅家的南

屋。许广平在8月中旬在这里住了五六天,以后也常到这里住宿。这作品,是纪实?是寓言?是象征?是讽喻?按照通俗的理解,它是否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定情以后,他们的爱情又快速地进入了新的更高的阶段。这篇作品当时也为鲁迅扣下,没有发表,但他们一直保存着。它现已编入《许广平文集》。

刘绪源先生在2000年早春二月为这本书写的序中特地指出了这本书的两个新意:“书中的新意,我想读者自会去领略,此处只举两个例子,以便于管窥全豹。鲁迅与许广平同居的时间,过去的传记作者多定在上海时期或广州时期,而本书认为,早在北师大闹学潮的时候,许广平曾暂住鲁迅家中,当时两人便已同居,那是1925年的事,许广平才26岁,还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作者是从一些外围材料入手进行这一研究的,其中主要是根据许广平的作品,尤其是一篇名为《魔祟》的独幕剧。我感到作者运用了一点近似于弗洛伊德的方法(2001年6月这本书再版时,这段话修订为如下的语言:作者对许广平的遗著《魔祟》提出了与过去有些人不同的独到的见解。《魔祟》早已公开发表,并已编入《许广平文集》,引起了一些人的研究,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作者不但分析了作品的内容,而且还注意到所写的环境、时间,从而得出了自己的判断)。我是很欣赏这种研究的。另外,在关于鲁迅葬礼的描写中,作者强调了救国会当时所起的重大作用,这就把久已为人们所遗忘的历史真相重现在世人的眼前。”

这本书出版没多久,裘真就在《着了魔的心理分析》(刊《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3期)一文中对这本书做出了批评。裘真首先引用了许寿裳、许广平、周作人共同编撰而由许寿裳总其成的“最为可靠、最具权威”的《鲁迅年谱》,指出,许寿裳在该年谱1927年10月项下原来写的是:“与番禺许广平女士以爱情结合,成为伴侣”。许广平定稿时,将这行文字改成了简单明了的6个字:“与许广平同居”。裘真强调:“以许广平心胸之开阔,思想之前卫,有什么必要故意把她跟鲁迅的同居的时间推迟两年呢?”裘真认为《魔祟》是许广平“在上海跟鲁迅同居生活的艺术写照,委婉含蓄地抒发了她对鲁迅的缅怀和愧疚之情——这种愧疚之感正是她对鲁迅挚爱 and 对自己苛责的自然流露。”而“《鲁迅与许广平》一书的作者无视上述历史背景,把鲁迅故居南屋接待一般来

客的客厅当成了鲁迅通宵写作的书房,尤其不能原谅的,是有意或无意地抹杀了许广平当时跟许羨苏同住的事实。经过这种走火入魔的分析与大胆的加工篡改,鲁迅的正义之举就变成了金屋藏娇、乘人之危的劣迹。这种主观臆断的不良学风居然能受到某些人的欣赏,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倪墨炎在4月28日发表了《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几个问题》(刊《文汇报读书周报》)一文反驳裘真的批评。倪墨炎首先指出:《魔祟》所写不是夫妻间日常的性爱生活的“平凡的一幕”,而是极不平凡的一幕——它记下了鲁迅与许广平的第一次性爱生活。在分析了剧中的时间、地点之后,倪墨炎强调,“我们对于《魔祟》的结论是:内容是写鲁迅和许广平的第一次性爱,时间是1926年初夏,地点是北京西三条鲁迅家的南屋。由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在《鲁迅与许广平》中写得十分含蓄,但时间、地点和事情,还是不含糊的,细心的读者必可了解我们对《魔祟》所叙述的内容。”倪墨炎还在文中披露了“一个长途电话传来的惊人的信息:许广平对她人生历程中的事,是有记录的。其中记录着:1925年10月20日第一次接吻,1926年5月某日第一次性爱。”

6月23日的《文汇报读书周报》刊登了周海婴先生的《关于〈魔祟〉答倪墨炎先生》一文。周海婴在文章中谴责倪墨炎“不顾我的反对,不惜失信,不惜伤害我,公然侵犯我父母的隐私权”:在收到《鲁迅与许广平》样书后,周海婴发现书中“序二”有一段话不妥就打电话要求更正,指出应当以许广平自己的认定为依据即1927年和鲁迅同居,但这篇文章未能刊出,而他私下和倪墨炎说的几句话却被倪墨炎当做“绝密讯息”披露。

倪墨炎在《我和海婴先生的交往和争议》(部分内容曾刊载在《世纪书窗》)一文中回顾了写作《鲁迅与许广平》一书的前后和周海婴交往的经过,对周海婴的说法进行了辩解,并就史料和名人隐私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8月11日,“序二”的作者刘绪源先生为回应裘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他的文章而在该报发表了一封短信,承认自己原来说鲁迅与许广平在1925年同居的说法是错的,并引用倪墨炎的文章,强调“正确的时间应在1926年5月”。稍后,刘绪源又在《安徽文学》2001年第9期发表了《一段公案》一文。在文中,刘绪源首先回顾了这次论争的经过,然后指出:鲁迅与许广平真实的同居时间是1926年5月。这就与《魔祟》中的时间(初夏)与地点(极似北京西三条鲁迅旧居南屋)惊人地相合了。

倪墨炎在《从〈鲁迅与许广平〉谈到〈魔祟〉》(刊《上海鲁迅研究》12辑)一文中公布了他们对《魔祟》作了“逐字逐句思考”后的结论:“从《魔祟》的内容看,包括对B的心理压力和G的内心活动的表达,可以充分说明确实写鲁、许第一次性爱;从《魔祟》的环境描写,那房子一大一小隔为二,木门上的方框,床、门、窗(是推向院子的纸糊木窗)的位置,地上铺砖因而可以烟灰满地撒等细节,说明这确是发生在北京鲁迅家南屋;而时间必是1926年初夏:鲁、许在北京有可能在一起的‘初夏’,只有1926年的初夏。”

王锡荣既不同意倪墨炎的观点也不完全同意陈漱渝的观点。在分析了《魔祟》剧中的一些细节后,王锡荣认为:“相比之下,如果说这是写实,或以何处为依据的话,我宁愿相信这里写的是广州的白云楼”;“对该剧细细品味,就不难发现,它写的恰恰是同居生活而非‘第一次’”;“至于剧情的时间,最可能的是1927年的初夏”;“说写作的时间当在鲁迅去世后,是比较可信的”。王锡荣最后强调,《魔祟》“是寓言,是象征,而不是纪实”,“以它为据来确定鲁迅、许广平的‘第一次’,或两人生活中的某一具体事实,都未免有些过于大胆,为史家所不取。”

倪墨炎在《关于〈魔祟〉讨论中的几个问题》(部分内容曾刊载在《世纪书窗》)一文中对王锡荣的观点进行了逐一的批驳,并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在此之后,暂时还没有相关文章,这一论争暂时告一段落。据悉,还有一些相关文章正在撰写、发表中,因时间关系,无法收入本书。

二、鲁迅死因之谜

鲁迅死因之谜的论争可以追溯到1984年。

1984年2月22日,上海鲁迅纪念馆邀请上海九家医院的23位肺科、放射科专家审读鲁迅先生在1936年6月15日拍摄的X光片,这23位专家、教授组成的“鲁迅先生胸部X光片读片会”做出的“临床讨论意见”是:“根据病史摘录及1936年6月15日后前位X线胸片,一致诊断为:(1)慢性支气管炎,严重肺气肿,肺大皮包;(2)二肺上中部慢性肺结核病;(3)右侧结核性渗出性胸膜炎。根据逝世前26小时的病情记录,大家一致认为鲁迅先生死于上述疾病基础上发生的左侧自发性气胸。”这是首次科学地确定鲁迅致死的病因,纠正

了此前鲁迅死于肺结核的错误说法。

5月5日,《南京日报·周末》刊登了南京图书馆纪维周先生的《揭开鲁迅死因之谜》一文。纪维周引用了周建人的说法,指出须藤是具有侵略性质的日本在乡军人会的副会长并经常在电话里讲关于中日之间交涉与冲突的情况。在鲁迅去世后不久,有人就曾在密信中告诉周建人,鲁迅不是死于肺病,而是被日本医生所谋害。纪维周还指出须藤的误诊、延迟治疗及治疗报告与实际不符等情况,并表示“这真是一个谜,使人疑惑不解”。

纪维周的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日本的主要报刊在13、14日纷纷报道了纪文的相关消息,并陆续刊发了日本学者质疑纪文的文章。6月4日,日本《朝日新闻(夕刊)》刊发了专攻内科医学和鲁迅病史的专家泉彪之助质疑纪文的文章《鲁迅死因》。泉文认为,须藤与鲁迅的友谊是深厚的,彼此之间十分信赖。据须藤的治疗记录和增田涉的回忆,可以看出鲁迅之死,绝不是因注射针药后急速恶化所致,而是肺结核与肺气肿并发之故,这一结论与纪文的论断不吻合。泉文最后指出,以鲁迅的病状推论,即使在医学发达的今天,根据日本胸部临床治疗记录,其死亡率也达到百分之二十八点六。须藤医生未能成功地挽救鲁迅的并发症,应是无可指责的。纪文对于鲁迅有深谊的须藤,一个深得民誉、医德高尚的须藤作如是之断,令人难以苟同且深感遗憾。6月14日,该刊又发表了竹内好的《历史的认识与继承的重要性》一文,竹内好认为,根据当时有关鲁迅的纪录,医疗水平,鲁迅身体的衰弱情况,应该说,须藤是尽了全力,鲁迅的真正死因应该是不难做出判断的。竹内好强调,鲁迅死因新说的提出以及对其质疑,显然是中日两国之间不幸历史悲剧的后遗症。当今中日友好气氛中还罩有阴影,这是日本方面应该认识的。

7月21日,蔡琰在《团结报》发表《鲁迅先生并非死于肺病》一文,再次提出“鲁迅先生的突然病故,曾引起人们的怀疑”,有人在密信中要求周建人调查须藤。须藤的下落不明及与实际情形不符的医疗报告“给人们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

8月25日,《团结报》发表了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陈漱渝撰写的《日本读者对于鲁迅死因的看法》一文,在编者按中,报社强调:“指出鲁迅先生并非死于肺结核,而是死于气胸。这是一个可以研讨的医学课题,但由此而引申到当年治病的须藤医生有什么责任,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发表鲁迅研究室

陈漱渝同志的文章,以正视听。”陈漱渝首先介绍了纪维周、蔡琮的观点,然后介绍了日本学者泉彪之助和竹内好质疑纪文的观点,最后公布了周海婴就鲁迅死因委托他所作的说明:纪维周的文章,对鲁迅的死因进行推测,但未提供任何新的确凿的史料,不能代表中国鲁迅研究界的看法,也不能代表他本人的看法。

8月26日,日本《朝日新闻(朝刊)》以“鲁迅儿子周氏否定鲁迅之死与日本原军医有关的论点”的标题迅速报道了陈漱渝文章的观点。

9月8日,《南京日报·周末》刊登了批评纪维周的文章,编者在按语中指出:纪氏的文章发表后,国内部分鲁迅研究者来信指出,纪氏的怀疑没有根据,特别是鲁迅之死与霍元甲之死相提并论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这一指摘是正确的。本报刊登纪实的文章时缺乏慎重的态度。

9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夕刊)》以“鲁迅死因之谜的论争可以中止了——中国报纸刊登了自我批评”的标题报道了《南京日报·周末》刊登自我批评的消息,并指出“鲁迅之死的论争大致可以终止了”。

9月23日,上海鲁迅纪念馆副馆长杨蓝在《解放日报》发表《关于鲁迅胸部X线读片会始末》一文,文章强调,“前一时期,有的报刊发表文章,从读片会怀疑到鲁迅的死因,从鲁迅的死因又引申到对日本须藤医生的谴责是没有根据的。这既不实事求是,更有悖于科学态度。”

至此,这场关于鲁迅死因的论争因为政治和外交的因素而被强行终结了,纪维周先生作为论争的发起人也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

进入新世纪,周海婴先生再次提出鲁迅死因之谜。在2001年5月15日出版的《收获》杂志上,周海婴发表了《关于父亲的死》一文,提出鲁迅之死存在六大疑点:

疑点之一:周建人曾建议不要请须藤治疗。周海婴披露说,须藤是鲁迅信任的医生和朋友,但周建人曾听人说须藤是日本“乌龙会”副会长——“乌龙会”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侵略中国的——所以认为他不太可靠,建议鲁迅不要找须藤治疗。当时,鲁迅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疑点之二:美国肺科专家诊断认为,鲁迅患的是结核性肋膜炎,但须藤对此矢口否认。周海婴说,周建人曾亲口告诉他,那位姓邓的美国肺科专家医生

告诉鲁迅,该病如不及时治疗,不出半年时间就会有生命危险,但如果立即休养和治疗,则至少能活10年。然而,须藤在一个月后才承认鲁迅所患的病确是肋膜炎,才给鲁迅抽积水。

疑点之三:许广平认为,须藤的诊断报告有假。鲁迅去世后,须藤写了一份诊断报告。许广平认为,报告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的前段,讲鲁迅如何刚强等一类的空话,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倒填治疗时间的方法,十分可疑。

疑点之四:内山完造曾表示,不要找须藤治周海婴的病。周海婴披露,鲁迅逝世后,周海婴患病,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对周建人说:“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害了。

疑点之五:鲁迅逝世后,须藤似乎“失踪”了。周海婴说,鲁迅逝世后,他就再也没有遇到过须藤。解放后,许广平多次访日进行友好活动,曾见了许多好朋友,包括许多其他日本医生。但“奇怪的是,其中却没有这位与我家的关系那么不同寻常的须藤先生,也没有听到谁来传个话,问候几句”。

周海婴说:“日本人向来重礼仪,母亲访日又是媒体追踪报道的目标,他竟会毫不知情,什么表示也没有,这是不可思议的。”

疑点之六: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住院建议。周海婴说:“须藤似乎是故意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送入医院治疗总是为病人家属所愿意的。须藤为什么没有提出这样的建议,而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周海婴最后说:“如今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这件隐藏在上辈人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

周海婴的这篇文章被多家著名媒体转载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读者相信了鲁迅先生是被日本人害死的说法。一些鲁迅研究专家在接受记者对此事的追踪采访时也表示经过仔细研究,须藤的诊断报告确实和鲁迅日记有关治疗的记载不符合,疑点并非没有。另外,须藤误诊这一事实基本上可以确定。至少在鲁迅肺气肿发作后,须藤没有及时采取抢救措施。此外,须藤

在最后阶段的治疗措施也不恰当。专家们强调,须藤医生确实延误了鲁迅的病情,同时对鲁迅的病情也存在着误诊,作为一个守护在病人身边、相当于“专职医生”的人,须藤很难洗脱“故意不抢救”的嫌疑,但也认为现在还没有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鲁迅是受须藤谋杀的,也没有根据说明是政治谋杀。

何满子先生在评论周海婴的书(《文学自由谈》2002年第1期)时也披露了他所亲历的一件事:1950—1951年在上海医学院兼课期间在一次会议间隙听到几位医学专家在议论鲁迅的死因。他们的意见是:三十年代尚未发明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彻底治愈肺结核的确很难,但治疗这种病也并非没有别的什么手段,手术如果准确及时,是能延长患者的生命的。他们断定,这个须藤肯定不是肺科专家,医技平常,耽误了治疗时机。当时根本不知道须藤有日本军人组织乌龙会的副会长的背景这个可疑身份,所以只判断为庸医误人,应属于医疗事故。

秋石在质疑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时对周海婴的疑点提出了批评,他强调:“鲁迅因肺结核晚期又不同意外出休养治病,于1936年10月19日逝世。应当说,有关鲁迅的死因是十分明了的,也是一个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鲁迅的死因并非像海婴所说的是一个‘公案’,倒是海婴所言中,同鲁迅当年的书信日记及同他人的谈话,同许广平、冯雪峰、茅盾、胡风等一些亲近者及当事人的当时记述,有着如此之大、之多的差异”。“历史的真实是谁也不能捏造或篡改的”。

作为医学专家和鲁迅研究专家的周正章先生在2002年1月发表了《鲁迅先生死于须藤误诊真相》(《鲁迅世界》2002年第1期)一文,对周海婴再次提出的鲁迅死因之谜做出了详实的考证,这篇长达3万多字的文章初稿写于1984年3月,最后改定于2001年11月,历时长达17年。周正章引述了1984年2月22日由上海九家医院23位专家、教授组成的“鲁迅先生胸部X光片读片会”做出的“临床讨论意见”,在此基础上,周正章指出“鲁迅是直接死于自发性气胸的这个科学结论是谁也动摇不了的”,但纪维周、蔡琼引用上海读片会结论质疑须藤医生的两篇小文章在1984年发表后“却引来了对鲁迅死因真相探讨的大封杀”,使“鲁迅死因真相又被尘封了17年”。周正章通过对比鲁迅的日记和须藤的《鲁迅病历》指出须藤伪造病历和倒填病历的事实,并结合医学知识分析鲁迅亲友对鲁迅患病期间的回忆,强调须藤当时在自发性气胸的

病理、病因、诊断、治疗上具备挽救鲁迅生命的客观条件,然而从他的处理、治疗、预后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他在主观诊断上出现了偏差,从而揭示出鲁迅死于须藤误诊的真相。

王锡荣和周正章的观点略有不同。王锡荣在《鲁迅死因之谜》(《鲁迅世界》2002年第4期)一文中首先回顾了“鲁迅X光片读片会引起的轩然大波”,接着引述了“周海婴的旷世疑问”,并摘录了鲁迅的病史及鲁迅关于自身疾病的相关叙述和须藤的《鲁迅病历》,在此基础上,对周海婴的疑问逐一做出了解答:综合以上对周海婴先生八点疑问的解说,看来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了。

王锡荣认为真正的疑点在于:第一,鲁迅本人的记载与须藤的记载不一样:(1)很多次看病漏记、误记;(2)病状描述不一致;(3)抽取积水时间有对不上之处;(4)用药与鲁迅的记录对不上。第二,危急时的处理有误。在此基础上,王锡荣认为,“无论怎么说,不管有意无意,须藤最后处置失误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王锡荣在文章最后指出须藤的误诊有其客观原因,但不敢说一定是百分之百主观原因,他认同误诊说,但对“伪造病历说”还不敢轻断,只同意“倒填病历”的说法。

严家炎先生也对秋石批评周海婴质疑须藤医生的文章提出了反批评。在《鲁迅的死与须藤医生无关吗?》(刊《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19日)一文中,严家炎指出了“抹不去的须藤医生的可疑点”:(须藤医疗)“报告的最大特点是把鲁迅肋膜积水的检查与治疗时间提前了整整3个月”,“这不是在死无对证的情况下明目张胆的伪造病例吗?”“须藤编造这类谎言,其用心难道不正是为了掩盖他本人‘延误’鲁迅病情的重大责任吗?”严家炎最后强调,海婴采取的态度是:只把前辈的想法和有关疑点记录下来,“将自己之所知公诸于众。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无从下结论,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应该说,这是一种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该受到误解和责备。

稍后,秋石就严家炎的批评做出了回答。在《实事求是是学术论争的基本原则》一文中,秋石指出,“鲁迅对须藤是相当尊重的,许广平也如此”,“须藤早在邓恩医生诊断之前就向鲁迅发出了‘两回警告’”,以此可以否定严家炎、周海婴等对须藤“拖延治疗”的指责。秋石认为,“须藤并非肺病专家,偶尔出现误诊也是在所难免,但提及‘谋害’或蓄意‘拖延治疗’,迄今没有任何确凿的

依据。”

面对众多质疑与批评,秋石在2003年5月出版的《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2期)上发表了《鲁迅病重、逝世及大出殡始末》一文对他在2002年9月17日发表在《文艺报》上的《爱护鲁迅是我们的道义》一文进行了补充。秋石再次强调“鲁迅死于疾病”:“正因为鲁迅执意不去国外养病,不愿停止战斗,才使病体越来越沉重”;“正是他夜以继日的为亡友编辑文稿,加剧了他的病情,耽误了治疗,从而过早的走向死亡”。秋石还引用鲁迅和内山完造的相关文章指出:“作为医生,须藤先生可以说是负责的。特别是在挽救鲁迅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其要求内山完造先生再请其他医学专家前往诊治来看,须藤医师不仅没有延误诊治,而且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周正章对秋石的观点再次进行了批驳,在《再驳秋石关于鲁迅死因的“实事求是”》(刊《鲁迅世界》2003年第4期)一文中,周正章首先指出秋石在《爱护鲁迅是我们共同的道义》和《实事求是学术论争的基本原则》两文中关于鲁迅死因的说法不同:前文认为须藤与鲁迅之死无关,而后文又认为鲁迅之死与须藤误诊有关。周正章认为秋石用须藤在10月18日“实施救治的情况”去回答严家炎所指的1936年3月间须藤伪造鲁迅病历以掩盖其对鲁迅病情的“延误”,是“在与严先生大捉迷藏”。即使是须藤在10月18日对鲁迅的救治也是“一筹莫展”的,没有采取正确的救治方法。对于秋石引用的周海婴在1984年8月2日委托陈漱渝发表的声明:纪维周的文章,对鲁迅的死因进行推测,但未提供任何新的确凿的史料,不能代表中国鲁研界的看法,也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周正章认为“这个口头问答对周海婴表达有关鲁迅死因的看法没有任何约束力”。2003年5月5日,周正章特地为此事询问周海婴,周海婴表示:纪维周的文章写之前没有和我联系过,怎么能代表我的看法呢?陈漱渝的文章在发表之前,也没有给我看过。

陈卫平在《对历史真相的推断要讲究逻辑性——与秋石先生商榷》(刊《中华读书报》2003年7月16日)对秋石文章的逻辑性提出批评,他指出,“感情是不能代替科学研究,特别是不能渗入于带有考证性的史料研究中去的。当我们还无法拿出真凭实据,还只能依据间接资料对历史真相进行推测的时候,逻辑的必然性是联系事实真相的惟一纽带。可惜的是秋石先生的论述在这方面并不是十分严密。”